

专题文章

美国基督教组织的全球扩展 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①

涂怡超^②

【内容摘要】 美国基督徒人数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基督教在美国社会发挥深远影响。自 19 世纪末以来，美国基督教组织成为世界传教运动的领头羊。美国基督教组织，尤其是福音派组织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亦与日俱增，其在国内外两大层面的多方面影响均值得当今众多国家行为体予以关注。本文意在研探美国基督教的全球扩展对 21 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进而阐明，美国基督教的全球扩张是美国基督教组织更为强势政治参与的基石；对《圣经》的不同诠释导致了不同基督教组织和个人政治信念的歧义；美国基督教组织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有限；同时美国基督教组织的政治参与亦受到组织自身现实利益的束缚。

【关键词】 基督教 美国教会 全球化 美国外交政策

①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青年项目“基督教与当代中美关系”（项目编号：08CZJ06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项目编号：061JZD005）、复旦大学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外交”（项目编号：05FCID0015）的资助，感谢《美国问题研究》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② 涂怡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美国基督教组织的全球扩展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是当代基督教的重要中心，美国基督教组织以“全地归主”为鹄的，救援与发展为双翼，推动全球基督教迅猛发展，并在传教相关神学思想、社会参与观、人员培训、组织建设、项目实施乃至资金提供等各方面居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各类基督教机构以信仰为体、组织为用，持续发展壮大，国际和国内政策影响力不断增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基督教的全球扩展获得美国政府的进一步支持，并出现与美国安全战略合流新趋势。

本文拟厘清美国基督教全球扩展对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救援与发展、人权与宗教自由、战争与反恐四大方面的互动关系，进而分析其政治影响。本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探讨当代美国基督教组织的全球扩展，第二部分论述基督教组织及其政治导向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合流的新趋势，第三部分旨在分析美国基督教的全球扩展对美国外交政策诸方面的影响，最后部分为结论。本文的美国基督教组织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传统的美国基督教组织，包括宗派、教会、神学教育机构及救援与发展组织。^①

^① 美国国内对当代基督教与政治的研究主要研究基督教对美国国内公共政策的影响，较少涉及外交政策层面。在对基督教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展开研究的著述中，对天主教、主流教会的研究相应较少，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基督教新右翼对美以关系及美国的中东政策的影响、基督教新右翼为捍卫其伦理而进行的跨国联盟及游说方面。影响较大的研究有著名宗教社会学家 William Martin, "The Christian Righ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No. 114, Spring, 1999, pp. 66-80. 一文主要分析基督教右翼反对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游说和为拯救受迫害基督徒而推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著名外交政策专家 Walter Russell Mead 认为，福音派的观点对大部分美国人很有说服力，也更能表明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观点。尽管近年来福音派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方面落力甚多，但他们对政府、多边国家间机制有天然的怀疑，更倾向于通过草根和宗教组织，更多倾向于问题解决而不是制度建设。Walter Russell Mead, "God's Country? Evangelicals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5, 2006, pp. 24-43, 此外，Lee Marsden, *For God's Sake: The Christian Right and US Foreign Policy*, London: Zed Books, 2008. 分析了基督教新右翼在推进民主和人权、环境、中东政策方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迄今为止中国国内此类研究有限。近年来徐以骅对宗教与美国外交的关系的重点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徐以骅《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80—117页；徐以骅《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载《和平与发展》，2008年第一期，第62—66页；徐以骅《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二期，第33—38页。

一、“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基督教的全球扩展

美国基督教对外传教起步甚晚，初始之时举步维艰，却发展极为迅速。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回溯，美国对外传教的组织结构自 19 世纪初以美部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为代表的跨教会传教组织为主导^①，自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向以宗派为主导的传教组织过渡。19 世纪末，德怀特·穆迪 (Dwight Moody)、阿瑟·皮尔逊 (Arthur Pierson) 等人发起和推进的学生志愿运动催生了众多独立对外传教机构。自“二战”结束以来，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逐渐成为活跃的行动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巨型教会 (megachurch)^② 也积极参与对外传教。2001 年，美国用于海外事工的金额超过 37 亿美元，全职海外传教士人数达 42,787 人，同时有 346,225 人前往海外进行短期传教，比 1998 年增长了 255%。2010 年仅新教即有长期传教人员 43500 名，700 个国际性基督教组织在 211 个国家和地区活动。^③ 无论从海外事工金额、还是长短宣的人数上看，美国的海外传教运动的规模都在不断壮大。基督教研究机构往往将海外事工机构按功能分成传教、教育及培训、传教支持、救援和发展这四大类。^④ 大型机构往往同时具备以上四大类功能。当前美国具对外传教功能的组织主要可分为四类。

① 美部会于 1812 年设立，得到公理会、长老会、美国归正会等支持，但公理会以外的宗派后来逐渐退出。

② 本文的巨型教会 (Megachurch) 采用对该类教会有权威研究的哈特福德宗教研究所的定义，即每周参与教会仪式超过 2000 人的新教教会。根据 2005 年统计数据，美国有巨型教会 406 个，每周参与教会仪式人数平均为 3857 人。其中 56% 为福音派教会，8% 为灵恩派教会，8% 为五旬节派，2% 为基要派教会。http://hrr.hartsem.edu/megachurch/definition.html

③ Patrick Johnstone and Jason Mandryk eds., *Operation World: 21st Century Edition*, Waynesboro: Paternoster Lifestyle, 2001, p. 33-34. Patrick Johnstone ed., *Operation World, 7th edition*, Colorado Springs: Biblica Publishing, 2010, p. 862. 可供参照的另一组数据是，美国人对慈善和志愿组织的总捐款为 2603 亿美元，捐往宗教组织的钱则为 932 亿美元。Giving USA Foundation, *Giving USA 2006*, Glenview: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Fundraising Counsel, 2006; Robert Wuthnow, *Boundless Faith: The Global Outreach of American Church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 24.

④ Dotsey Welliver and Minnette Northcutt eds., *Mission Handbook 2004-2006: U. S. and Canadian Protestant Ministries Overseas*, Wheaton: EMIS, 2004, pp. 43-44.

其一为宗派所属传教组织及跨教会传教组织。

天主教会、主流新教和福音各宗派及希腊正教均有下属传教机构，但规模相差极大。美南浸信会国际传教部是新教各宗派中规模最大的传教机构，而学园传道会则为最大的跨教会传教组织。天主教外派传教士的工作多由修会承担，也有教区直接派出传教士，而天主教平信徒海外传教人数也在不断增长。

表一 2001 年外派美国传教士人数居全美前 10 位的基督新教组织

| 组织名称 | 派别 | 国家数 | 传教士数 |
|---|------|-----|-------|
| 美南浸信会 (国际传教董事会)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 福音派 | 7 | 5 437 |
| 神召会 (Assemblies of God World Missions) | 福音派 | 119 | 1 708 |
| 新部族传道会 (New Tribes Mission) | 福音派 | 22 | 1 496 |
| 学园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Jesus Christ) | 福音派 | 113 | 1 496 |
| 浸会国际传教会 (Baptist International Missions , Inc.) | 福音派 | 1 | 1 040 |
| 基督教会 (Christian Church/Churches of Christ) | 主流教会 | 66 | 1 015 |
| 门诺中心委员会 (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 | 福音派 | 4 | 874 |
| 国际浸会圣经团契 (Baptist Bible Fellowship Intl.) | 福音派 | 69 | 819 |
| 基督会 (Churches of Christ) | 主流教会 | 91 | 816 |
| 长老会国际传教部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 World Wide Ministries) | 主流教会 | 66 | 772 |

* 数据来源: Dotsey Welliver and Minnette Northcutt eds. , Mission Handbook 2004-2006: U. S. and Canadian Protestant Ministries Overseas , p. 35 , pp. 308 - 314.

表二 2002 年美国天主教会海外传教士人数、地区、性别简表

| 地区 | 男传教士人数 | 女传教士人数 | 总数 |
|-------|--------|--------|-----|
| 非洲 | 376 | 328 | 704 |
| 亚洲 | 491 | 244 | 735 |
| 加勒比地区 | 195 | 147 | 342 |
| 欧洲 | 94 | 86 | 180 |

(续表)

| 地区 | 男传教士人数 | 女传教士人数 | 总数 |
|------|--------|--------|------|
| 拉丁美洲 | 622 | 625 | 1247 |
| 中东 | 30 | 5 | 35 |
| 加拿大 | 23 | 34 | 57 |
| 大洋洲 | 111 | 64 | 175 |
| 总计 | 2596 | 888 | 3484 |

* 数据来源: U. S. Catholic Mission Handbook, Washington D. C.: U. S. Mission Association, 2002, pp. 37-39.

其二为基督教救援和发展组织。

当前一些规模巨大的美国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亦已分别建立了遍布全球各地的网络。它们相互之间也长期开展组织和活动方面的协调和配合。总量巨大的中小型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在世界各地积极参与活动。

天主教救援服务会 (Catholic Relief Services) 事工遍及 5 大洲 101 个国家, 2009 年业务支出 7.68 亿美元, 是美国最大的天主教救援与发展组织。^① 福音派组织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是美国最大的国际救援及发展机构, 也是世界三大国际救援及发展非政府组织之一, 在全球 96 个国家或地区开展工作。而主流教会最大的救援与发展组织是美国基督教协进会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USA) 的教会世界理事会 (Church World Service)。现在的主流教会在海外传教和国际救援与发展方面采取和福音派有所不同的路径, 主流教会重视建立与海外教会、政府部门和当地救援发展部门的伙伴关系, 通过协同事工和合作达成目标, 而福音派组织则往往更为直接地进入当地开展事工, 但近年来各类福音派组织事工地当地雇员的数量在不断增长。

^① PDF 文件, 2009 Annual Report of CRS, p2, p. 32. 下载地址: http://crs.org/about/finance/pdf/AR_2009.pdf

表三 大型基督新教跨宗派救援与发展组织事工简表 (2003 年)

| 排名 | 机构 | 海外事工金额 (美元) |
|----|---|--------------------------|
| 1 | 世界宣明会 | 358 703 000 ^① |
| 2 | 基督徒救援会 (Christian Aid Ministries) | 132 988 645 |
| 3 | 撒马利亚人的钱袋 (Samaritan's Purse) | 111 797 883 |
| 4 | 饥援会 (Food for the Hungry, Inc) | 69 896 261 |
| 5 | 国际救援会 (International Aid) | 67 125 062 |
| 6 | 教会世界理事会 | 57 998 444 |
| 7 | 育童会 (Feed the Children) | 45 178 413 |
| 8 | 西北医疗队 (Northwest Medical Teams, 现名国际医疗队 Medical Teams International) | 34 548 705 |
| 9 | 关怀世界 (World Concern) | 34 325 723 |
| 10 | 殉道者之声 (Voice of Martyrs) | 21 364 009 |
| 11 | 志愿医疗船 (Mercy Ships) | 19 682 881 |

* 资料来源为: Dotsey Welliver and Minnette Northcutt eds., *Mission Handbook 2004—2006: U. S. and Canadian Protestant Ministries Overseas*, pp. 29—30, pp. 308—314.

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的事工主要有五大块: 救灾、儿童项目、艾滋病/艾滋病毒感染、小额信贷以及卫生保健。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网络不仅由这些超大型组织组成, 还包括难以计数的各类小型组织。众多组织每年海外事工金额少于 100 万美元, 全职事工人员也寥寥无几。但很多小型组织事工有其强烈的针对性。有的组织专注于单一事工, 如农业发展、盲人服务、收

① 近年来很多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海外事工费用大幅提升, 如 2010 年世界宣明会用于海外事工的金額达 728 572 000 美元, 国际医疗队则为 210 599 409 美元, 数据来源为 PDF 文件,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World Vision*, 2010, p. 6, 下载地址: [http://www.worldvision.org/resources.nsf/Main/annual-review-2010-resources/\\$FILE/AR_2010AuditedFinancialStatement.pdf](http://www.worldvision.org/resources.nsf/Main/annual-review-2010-resources/$FILE/AR_2010AuditedFinancialStatement.pdf); PDF 文件, 2010 financial 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am, p. 6, 下载地址: http://www.medicalteams.org/sf/Libraries/Financials/FY10_6_30_10_Audited_Financial_Statements.sflb.ashx。一些组织的财务报告未将国内和海外事工开支予以区分, 不可得海外事工的单独详细数据。

养扶助等等；有的组织专注于某国或某一地区的事工，如专事匈牙利、中国、印度、苏丹等不同国家的救援与发展。正是众多此类中小型组织构成了网络的坚实基座，让救援和发展事工深入到世界众多被大型组织遗漏或无力顾及的偏远角落，各类基督教组织之间各种形式的合作也日益频繁。

其三是众多地方教会直接参与海外传教、救援和发展工作。

以往地方教会一般间接支持海外事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不仅以马鞍山教会（Saddleback Church）为代表的众多巨型教会对海外传教更为重视，越来越多的中小型地方教会也从事直接的海外传教、救援与发展工作。这既受到基督教传教宗旨的推动，也缘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各类媒体将全球信息及时传送，小部分教会成员频繁海外旅行，以及新移民成为教会的成员，推动对其原在国传教等各种事宜的关注。

其四是进行海外传教培训的美国各类神学院。

美国是世界基督教神学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接纳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各类神学院以教育为媒介推动着世界各地基督教的发展。这其中不仅包括各类学历教育，还包括各类进修、短训。众多基督教组织为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神学生提供了各类奖学金。美国各类神学教育机构为世界各国培养了大批各层次的基督教领袖。美国的众多神学院与国外各类神学机构展开种类繁多的各类合作，很多教师频繁走出国门，前往世界各地进行神学培训，时间或长或短。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借助英语在国际交往中独特的地位，美国基督教高涨的传教热情、强大的经济后盾与各类传教、救援和发展组织密布全球的网络紧密结合，通过电影、电视、广播、网络、图书、杂志等各类媒体，采取遍及全球的布道会、救援、发展和教育等多类方式，其触角已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伸入世界各地，乃至诸多偏远角落都深受其影响。在交流旅行日益简便快捷、各类传媒触角伸向全球的今天，国内牧养和海外传教的界限日益模糊，难以将两者切割进行分析。福音派、包括五旬节派和灵恩派在海外的迅猛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他们打破固守福音的基本形态，扩大了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成为他们进一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基础。

二、美国政府机制调整与基督教组织行动空间的拓展

美国政府与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主要是基督教组织自 19 世纪前半叶开始合作磨合,这种伙伴关系至 19 世纪末初见雏形,但“二战”前宗教非政府组织很少接受政府资助。自“二战”以来,美国政府开始逐渐向现代福利国家转型,政府资助开始成为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的来源。然而,直至“二战”前宗教非政府组织很少接受政府资助。美国政府一直避免将政府项目与宗教改宗纠缠在一起。之前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主流解释更为强调宗教与政治的隔离,另一方面也是保证受助者不必皈依资助者的宗教信仰。而自“二战”以来,美国政府开始逐渐向现代福利国家转型,20 世纪 60 年代林登·约翰逊政府推进伟大社会计划,此间政府对宗教组织协助政府进行社会服务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加,政府资助开始逐渐成为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同时,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也是美国为稳定穷国对抗共产主义而采取的行动的一部分。^① 世界宣明会 20 世纪 60、70 年代在越南和柬埔寨的救援工作就得到美国开发总署的积极支持。目前世界宣明会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分发组织,而这些粮食几乎全部来自美国政府的国际援助。^②

1994 年中期选举共和党获胜,保守派成为国会多数。1996 年,《慈善选择法》(Charitable Choice Act 1996)^③ 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福利改革立法通过,尽管其意义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法案规定宗教非政府组织与其他世俗非政府组织一样有权获得联邦资助。

减除联邦税、革新联邦教育政策和扩展以信仰为基础的项目是 2000 年小

^① Robert Wuthnow, *Boundless Faith: The Global Outreach of American Churches*, p. 124.

^② PDF 文件, “An Ambassador for Christ: Brady Anderson, Chairman of the Board,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下载地址 http://www.rts.edu/Site/Resources/ReformedQuarterly/Docs/RQ_Winter05_Online_BradyAnderson2.pdf

^③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6”, <http://www.mrsc.org/Subjects/HumanServices/welfare/welfare.aspx>,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z?c104:H.R.3734.ENR>:

布什竞选总统的三大主张。在其任期内，美国政府对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进行的资助也走上新台阶。尽管相关立法受挫，自2001年始，布什政府通过一系列“少有关注”的行政命令悄悄去除了政府资助宗教非政府组织的诸多限制。^① 13198号行政命令等减少对雇佣人员宗教信仰的要求，从而有利于这类组织内部保持宗教信仰的同质性，由于美国基督教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具有压倒性优势，这类措施令基督教组织成为最大受益者。仅2003财政年度，联邦政府各机构对宗教非政府组织的拨款即超过10亿美元，^② 尤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拨款为最，而该署本身的战略重点即在于世界各国的民主和政府治理，“对诸多民主过渡进程做出了积极贡献。”^③ 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成为美国对外“民主促进”的重要合作伙伴。

2001年1月，小布什颁布行政命令，成立白宫信仰为基及社团倡议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Faith-based and Communities Initiative，简称OFBCI）。2009年2月，奥巴马将该办公室重命名为白宫信仰为基及邻里伙伴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Faith-based and Neighborhood Partnerships）并进行结构重组，同时为办公室任命了一个顾问委员会，顾问大部分是宗教领袖。^④ 该办公室帮助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 and 社区组织在不损害其宗教自由的基础上竞争和赢得政府拨款。在创始之初侧重于国内项目，如今也关注国际项目，如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项目和总统疟疾项目等，而这些预算巨大的项目拨款亦通过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分发，为信仰为基础的组织进一步拓展

① 除了立法倡议，小布什政府在其第一个任期还请求国会向小型社团提供“富同情心的投资基金”，以便推动它们的发展和雇佣必须的专业人员，而在全国范围内这些小型社团大多为信仰为基础的组织。国会给予批准，行政部门则运用这笔资金推动以信仰为基础的小型组织和其他社区社会服务小型组织的发展，帮助“平整竞技场”，给予小型组织公平竞争的机会。Mark J. Rozell and Gleaves Whitney eds., *Religion and the Bush Presidency*, New York: Palgrave, 2007, p. 157.

② David K. Ryden and Jeffrey Polet, "Introduction: Faith-Based Initiatives in the Limelight," in David Ryden and Jeffrey Polet, eds. *Sanctioning Religion? Politics, Law, and Faith-Based Public Servic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5, pp. 4—5.

③ Thomas Carothers, *Revitalizing Democracy Assistance: The Challenge of USAID* (Policy Report),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9, p. 1

④ 该行政命令及顾问委员会成员名单，可参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ObamaAnnouncesWhiteHouseOfficeofFaith-basedandNeighborhoodPartnerships/

了活动空间。2001年以来,在司法部等11个联邦部门中设立了以信仰为基础的中心,负责与白宫信仰为基及邻里伙伴办公室协调,以简化政府规章制度和文书工作,提高信息可及性,帮助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获得管理政府需求必需的技术能力。同时培养政府职员有关以信仰为基础的发展组织及其工作的知识,就相关议题主办会议、组织讨论。经过多年努力,行政部门长久以来形成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隔离墙从意识上到实践上有所松动,美国官僚体系的文化逐渐从自觉与宗教隔离,转向将宗教组织视为适当的或可能的合作伙伴。由此,教会组织在政府部门的的活动空间不断得以扩展,影响力也有上升趋势。

“民主促进”向为美国外交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911”以来进一步提升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国防、外交和发展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也是美国运用其权力和影响以期主导世界各地的“民主化”浪潮的三大途径。近年来美国朝野进一步认识到仅凭政府之力、倚重军事力量的单边主义无法达成对世界各国草根层面的深入影响,难以在全球层面有效、稳定地输出民主,硬实力和软权力必须整合成为巧实力,外交和发展在民主输出战略中的作用上升,推动公共外交、协力民间外交、直接和间接透过美国和他国非政府组织落实发展项目均为以巧实力推进美式民主输出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宗教自由问题在美国朝野逐渐安全化。正如国际危机集团(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在报告中所总结“将宗教自由作为安全问题,而不仅是人权问题,明确提倡只有在宗教自由获得保障、团体和个人行动不受压制的情况下,地区安全才可确保。”^①

由此,美国基督教组织因其自身特点在美国进一步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民主以巩固自身安全的长期战略中居处要津。美国政府依靠福音派传教组织

^① See Robert A. Seiple, “Religious Freedom: A Legacy to Reclaim,” in Elizabeth M. Bucar and Barbara Barnett eds., *Does Human Rights Need God?*,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5, p. 272.

或救援与发展组织达成其自身国际战略目标由来已久。“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传教热情高涨。一些福音派领袖及其组织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自身传教利益的考量，积极协助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美国的冷战战略、70、80 年代的拉丁美洲战略，甚至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展开密切合作。冷战结束之后，尤其是“9·11”以来，美国政府为基督教组织的海外活动从资金、政策等多方面开拓空间，而美国基督教的全球扩展提供的话语与认同、传递的信息与近年来的美国的安全战略有甚多合拍之处，而今后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则与世界局势和美国全球战略的互动存在密切关系。

三、对当前美国外交议题的立场及对相应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利益遍布世界，需要各种力量来对其世界体系进行扶持、互补。美国基督教的全球扩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美国公民社会和美国价值体系的外延，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其政治影响需通过与大大小小的美国本土教会、宗派总部相关组织宗教非政府组织总部及其他相关组织及个人共同协力而达成。200 余年来，美国基督教组织依凭派往他国的传教士、差会、各类救援和发展组织和教育机构，或深或浅地嵌入各国宗教系统、社会和政治领域，一直是美国政府的重要信息来源。

数百年来，基督教组织深植于美国的公民社会中，具有首屈一指的草根动员能力。自 20 世纪以来，众多基督教组织和领袖注重发展州和联邦层面的精英纽带，不少基督教领袖亦进入政界，直接成为政策制定者或执行者。就联邦政府层面的精英游说而言，美国众多教会或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在华盛顿设有办公室，负责与政府各分支和各部门的沟通与游说。教会领袖通过国家祈祷早餐等形式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官民代表开展和深化联系。相关人员积极参与国会的各类听证会和外交政策简报会、与各部门政府官员会晤。众多长期服务于教会组织或其他宗教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往往凭借丰富的相关经验而直接进入各类政府部门或机构担任高级工作人

员或顾问。

宗教领袖亦努力建设和参与一些非正式却强有力的政界网络。保守的国家政策委员会（CNP, The Council for National Policy）1981年由基督教右翼运动的重要推动者、畅销基督教小说《末日迷踪》主创者福音派牧师蒂姆·莱希（Tim LaHaya）、传统基金会共同创始人保罗·韦里奇（Paul M. Weyrich）等共同建立，至今仍是基督教右翼领袖与保守政治领袖、金融和商业巨头、传媒大亨、法官和学界等沟通合作的重要组织，组织成员因对“自由企业体系、强大国防，并支持传统西方价值”的信守而联合在一起。^①一些看起来疏离政治的传教组织亦与政治保持密切关联。如威克里夫圣经公会的创始人卡梅伦·汤森（Cameron Townsend）去世之前一直是保守的政治倡议团体宗教圆桌会议（the Religious Roundtable）的重要成员，与杰瑞·法韦尔（Jerry Falwell）等基督教右翼领袖联系密切。而巨型福音派传教国际组织学园传道会的创始人比尔·布赖特（Bill Bright）则为这一团体及其他数个以信仰为基础的政治倡议团体的创始人之一。目前绝大多数大型宗派组织和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均在首都设有办公室，负责与政界各部门的联系沟通。

基督教组织对思想库亦发挥日趋深远的影响。一些基督教组织为思想库提供研究资助，众多宗教组织与思想库保持紧密的联系，提供信息、参与思想库组织的各项研讨会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一些思想库的研究人员本身或是基督教组织领导人或是相关成员，与基督教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基督教组织亦不断对媒体施加影响，扩大其思想和行动的号召力。各类基督教组织一般都拥有自己的媒体，如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及网络等，同时亦与其他类型的媒体保持联系或开展密切合作。

在影响基层教会和选民的草根游说层面，众多基督教组织，包括教会、跨教会组织、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各类基督教媒体及研究所的国内网络行动均非常活跃。他们注重基层动员，告知情况、募集捐款、发动请愿。

近年来，教会组织及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主要在四方面影响美国对外

^① 可参该组织网站简介，“about the Council for Public Policy,” <http://www.policycounsel.org/24508.html>

政策。

一是救援与发展议题。

这是基督教组织影响对外政策最有效的方面。大型国际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的工作人员或领导人经常因国际援助问题而与相关官员、议员会晤，或是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国会山议员及其助手、联邦政府的一些官员亦经常参加基督教组织举办的活动。

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协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采取草根动员和精英游说等多种方式，共同争取美国政府加大对世界各地救援与发展的扶持力度和拨款金额。在寻求联邦资助方面，基督教福音派组织和自由派组织有着不同的进路。自由派组织尊崇政教分离原则，在申请和运用政府拨款时一般将救援与传教分开。而福音派组织则一直在努力打破政教之间的隔离墙，在全世界运用政府拨款的同时开展救援与传教工作，有的组织仅在名义上划分不同来源款项的做法。近年来，福音派组织和领袖的相关游说从规模和效果均有显著增长。

众多基督教组织成为美国政府扩大海外救援和发展项目的最终获益者。根据《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的调查，2001—2005年，159个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获得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超过17亿美元的资助，享有的份额从10.5%飙升至19.9%。然而只有两个犹太教组织和两个伊斯兰教组织获得该署资助，98.3%的资助流向基督教组织。^① 尽管美国国际开发署管理着在世界84个发展中国家总金额约100亿的援助项目，其中一半以上国家是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但美国的穆斯林救援与发展组织仍极少申请到该署资助。^② 美国最大的犹太救援与发展组织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会(American Jewish World Service)在2006年前并没有直接获得该署防艾项目拨款，仅作为次级合作伙伴从世俗组织凯尔国际获得60万美元在肯尼亚从事防艾工作。与此同时，世俗组织获得该署拨款的比率也有下降趋势。凯尔国际(Care

^① Farah Stockman et al., "Bush Brings Faith to Foreign Aid," *The Boston Globe*, October 8, 2006. http://www.boston.com/news/nation/articles/2006/10/08/bush_brings_faith_to_foreign_aid/

^② PDF文件, "USAID Agency Financial Report 2007," 下载地址: http://www.usaid.gov/policy/afr07/usaidfy07afr_lowres_011008.pdf

International) 自“二战”结束以来年年获得该署拨款,2001年该组织获拨款1.38亿美元,到2003年降至0.98亿美元,2005年降至0.959亿美元,这与向世界宣明会等基督教组织拨款逐年增长形成鲜明对照。^① 尽管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令近两年众多基督教组织来自民间的捐款受到冲击,但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拨款仍稳步增长。

表四 世界宣明会 2007—2010 年度财政收入汇总

| 收入来源 (亿美元)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
| 私人现金捐款 | 4.27 | 4.68 | 4.56 | 5.28062 |
| 政府划拨 (食品及现金等) | 2.20 | 2.81 | 3.44 | 2.4095 |
| 礼物 | 3.01 | 3.66 | 4.13 | 0.251179 |
| 其他净收入 | 0.09 | 0.06 | 0.11 | 0.020355 |
| 总计 | 9.57 | 11.09 | 12.24 | 10.40546 |

* 数据来源: PDF 文件, “World Vision Annual Review 2009,” p. 2. 下载地址: [http://www.worldvision.org/resources.nsf/Main/annual-review-2009-resources/\\$FILE/AR_2009FinancialHighlights.pdf](http://www.worldvision.org/resources.nsf/Main/annual-review-2009-resources/$FILE/AR_2009FinancialHighlights.pdf); PDF 文件,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World Vision, 2010,” p. 6, 下载地址: [http://www.worldvision.org/resources.nsf/Main/annual-review-2010-resources/\\$FILE/AR_2010AuditedFinancialStatement.pdf](http://www.worldvision.org/resources.nsf/Main/annual-review-2010-resources/$FILE/AR_2010AuditedFinancialStatement.pdf)

表五 天主教救援服务会 2007—2010 年财政收入汇总

| 收入来源 (亿美元)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
| 私人捐赠 (现金和物品) | 1.52886 | 1.70912 | 1.56044 | 2.94287 |
| 政府划拨 (现金和实物) | 3.24573 | 4.28095 | 6.14123 | 6.18617 |
| 投资和其他收入 | 0.48583 | 0.12242 | 0.10427 | 0.06046 |
| 总计 | 5.26042 | 6.11249 | 7.80594 | 9.1895 |

* 数据来源: PDF 文件, “2010 Financial Statement Report of CRS,” p. 3, 下载地址: <http://crs.org/about/finance/pdf/2010-financials.pdf>; PDF 文件, “2009 Annual Report of CRS,” p. 32. 下载地址: http://crs.org/about/finance/pdf/AR_2009.pdf “2008 Annual

① Michael Kranish, “Religious right yields clout: Secular groups losing funding amid pressure,” *Boston Globe*, October 9, 2006, http://www.boston.com/news/nation/articles/2006/10/09/religious_right_wields_clout/

Report of CRS,” p. 28. 下载地址: http://crs.org/about/finance/pdf/AR_2008.pdf “2007 Annual Report of CRS,” p. 16, 下载地址: http://crs.org/about/finance/pdf/AR_2007.pdf.

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项目 (The U. S. 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PEPFAR)^① 在大多数国家的活动往往由一个或多个美国基督教救援和发展组织担任主要合作伙伴, 然后将资源和资金调拨给本地合作组织。世界宣明会、天主教救援服务会、撒马利亚人的钱袋、饥援会、基督复临会发展救济会、基督教救援会、世界救援会 (World Relief)、人子之肉 (Fresh Ministries)、希望国际、国际机遇、救世军 (美国) 这些美国基督教组织是该项目在多个国家的主要合作伙伴。^②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治理能力有限, 物质资源尚不丰富, 高水平人力资源匮乏, 迫切希望得到来自美国的救援和发展资源, 这也促使这些国家打开大门欢迎美国的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美国政府对各国情况深入了解的重要来源, 甚至深入到各国的诸多偏远地区和草根群众, 而这是官方外交难以达及的层面。

近年来, 一些基督教右翼组织以其“亲生命、爱家庭”的神学观为基础, 积极影响美国对外援助的使用。在艾滋病防治中, 他们主张戒绝婚前性行为、反对使用安全套、反对同性恋行为。为此, 基督教右翼组织与一些世俗组织产生严重观念冲突, 他们认为这些组织采取的防艾措施违背了他们的宗教价值观, 为此大力游说美国政府削减对其拨款, 凯尔国际就成为游说的重点目标。由于右翼基督教组织的施压, 凯尔国际所获拨款减少了 0.5 亿美元。而其他一些世俗组织也因此损失了大量拨款。^③ 与此同时, 一些以信仰

① 2003 年由小布什总统首创, 为每一期为五年的防治疾病项目。2003—2007 年项目拨款为 150 亿美元, 2008—2012 年项目拨款为 480 亿美元, 至 2008 年财政年度已在亚非拉 31 个国家开展项目, 至 2009 财政年度扩展为 88 个国家, 防治疾病种类从单一的艾滋病扩展到肺结核和疟疾。资料来源: <http://www.pepfar.gov/>

② 2004—2005 年这些基督教组织与该项目合作的相关资料, 如开展援助活动的国家、获得资金等, 可见于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编辑的一份 Excel 文件, “funding information for the 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下载地址: <http://projects.publicintegrity.org/aids//report.aspx?aid=816>; 该中心 2006 年 11 月诉美国国务院发布充斥错误的项目资金划拨信息误导公众。

③ Lee Marsden, *For God's Sake: The Christian Right and US Foreign Policy*, p. 135.

为基础的组织分得了另一项总数为 2 亿美元的防艾项目拨款。其中国际开发署认为不符合拨款标准但坚持以禁欲为原则的儿童艾滋基金会 (Children's AIDS Fund) 也在基督教右翼的压力下获得一项为期五年的 1 千万美金拨款。基督教右翼所谓“反卖淫”和“禁欲”事实上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发放防艾拨款的标准。因巴西政府认为说服性工作者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成功战略, 损失了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的 4 千万美金援助。^① 由部分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领导的疾病教育和预防项目对有关疾病的神学思想社会化具有推动作用, 甚至对所在国政治产生影响, 如今在乌干达已现端倪。^②

二是民主、人权及宗教自由议题。

民主和人权是基督教组织关注的重点议题, 保守的美国基督教右翼以《圣经》为基础、以美国经验为依托, 更是认为自由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美国价值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人权和宗教自由倡议方面, 目前基督教组织的主要关注领域有:

1. 对全世界“宗教迫害”的关注和倡议。由于信仰背景, 很多基督教组织的视角首先是基督徒在全世界的信仰自由实践, 从这一基点开始其人权倡议, 对美国政府或国际组织进行更有效的游说。这一议题是基督教界的统一议题, 而非分裂选项, 尽管自由派基督教组织与保守福音派组织在美国相关外交政策的进路而有所分歧。仅仅来自基督教组织一方的游说则力度不够, 需要建立更大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 基督教组织必须超越信仰、超越为世界其他地区基督徒代言这一范畴, 与种族、人权两大范畴的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 才有可能获得游说成效。1998 年,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即沿此进

^① Michael Kranish, “Religious right wields clout: Secular groups losing funding amid pressure,” *Boston Globe*, October 9, 2006, http://www.boston.com/news/nation/articles/2006/10/09/religious_right_wields_clout/

^② 2006 年提出、至今仍在乌干达议会审议中的《反同性恋法案》, 在国际社会广受争议和谴责。而这一法案的提出与美国基督教保守福音派在乌活动渊源甚多。Jeff Sharlet, “Straight man's burden: The American Roots of Uganda's anti-gay Persecutions,” *Harper's Magazine*, September, 2010, pp. 36—48.

路得以在国会通过并施行。^①

以就达尔富尔问题进行的游说为例。美国福音派的一些传教、救援和发展组织在达尔富尔危机之前就活跃于苏丹南部，并与当地的基督教团体建立了联系渠道，认为那里的黑人基督徒受到阿拉伯游牧民族巴加拉人的迫害并获得苏丹“宗教迫害”的最新资讯，有关信息源源不断自当地传回美国，一些基督教组织为此自20世纪90年代即开始在美国国内组织草根动员，加大对国会的游说力度，不断争取美国政府对此进行干涉，然而初始之时见效甚微。随后基督教组织与犹太组织等其他宗教组织开展合作，并与众多反种族歧视有色人种团体和人权团体形成联盟，开展了规模更大的草根、精英、国会和行政部门游说，国会在强大的联合压力下通过了《2002年苏丹和平法》。2003年，达尔富尔冲突爆发，2004年，拯救达尔富尔联盟（Save Darfur）成立，这是一个如今拥有180余个宗教、政治和人权组织的联盟，现有专业团队达30余人。达尔富尔游说的领导权掌握于犹太人权组织手中，主导者为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和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会（American Jewish World Service）。

一些大型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如世界宣明会、撒马利亚人的钱袋等积极参与了对苏丹的援助，随着这些组织在苏丹经营日久，对苏丹实情的了解日趋深入，世界宣明会与游说阵线拉开距离，而撒马利亚人的钱袋则立场日趋温和，转向积极改善与苏丹政府的关系。2009年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与该组织主席葛福临（Franklin Graham）会晤，讨论达尔富尔问题。^② 这些参与当地实际工作的组织逐渐将对话和接触视作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一些缺乏对当地情况细致深刻了解的宗教领导人则固持达尔富尔问题是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阿拉伯人与黑人之间冲突的偏颇观点，以此为话语构筑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游说同盟，不顾冲突其实主要发生在穆斯林之间这一事实。如美国福音联盟的理查德·西齐克（Richard Cizik）

^① 关于该法通过的背景情况，可参 All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for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② “Graham meets with President of Sudan Omar al-Bashir,” <http://www.christiantelegraph.com/issue5049.html>

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改革犹太教宗教行动中心联盟主任戴维·萨珀斯坦 (David Saperstein) 拉比 2005 年就曾在《华盛顿邮报》称 “当苏丹政府听从小布什总统的呼吁，在反恐战争中给予合作，并于 2005 年签署《全面和平协定》，从而结束穆斯林政府和南部基督徒及万物有灵论者之间长达 20 年的战争之际，却没有负责地将简加韦得民兵解除武装并驱散，令他们得以屠杀平民。” 而当时苏丹政府已有基督徒成员达 6 个月之久。^①

2. 对全世界难民、贩卖人口等严峻问题的关注与倡议。

这类议题是基督教各派别的无争议议题。基督教组织多采取联盟形式进行合作以扩大行动能力。互动行动 (InterAction) 是美国一个容纳了 160 余个最大的国际救援与发展组织的联盟，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一些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如天主教救援服务会、世界宣明会、饥援会、联合卫理公会救济委员会 (The United Methodist Committee on relief)、美国公谊服务会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世界之粮 (Bread for the Food) 等组织，涵盖光谱从基督教左翼到右翼。该联盟为达到其目标而组织跨信仰和跨宗教的联合倡议行动。这一联盟还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办事处有着密切合作，保护和安置受到战争和自然灾害侵害、其他各类人为迫害的难民。

贩卖人口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人权问题。如今每年仍约有 80 万人遭受跨国贩卖，数百万人在本国被贩卖，其中 80% 跨国贩卖的受害者是妇女和女童。^② 美国基督教界对人口贩卖这一犯罪行为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曾任职司法部的基督徒正义团契主席加里·豪根 (Gary Haugen) 具有深厚的教界背景，他将这一议题带入基督教界。2000 年，在迈克尔·霍罗威茨 (Michael Horowitz) 等人的组织和推动下，通过草根动员和各类游说，国会通过《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法》 (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 TVPA)。在主要来自基督教界和人权组织的推动下，该法于 2008 年再获修

^① Jodi Eichler-Levine and Rosemary R. Hihks, "As Americans Against Genocide": The Crisis in Darfur and Interreligious Political Activism," in R. Marie Griffith and Melani McAlister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89.

^② U. S. State Department, "2008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http://www.state.gov/g/tip/rls/tiprpt/2008/105376.htm>

正，防止贩卖人口成为国务院的一项日常工作，国务院成立一个专门办公室以推动解决这一问题的国际问题，并撰写年度报告。自2003年，国务院专门任命一名无任所大使负责解决当代世界各种形式的奴隶问题，工作职责是担当国务卿的高级顾问、监察与防止人口贩卖。2001—2009年，国务院每年发表相关报告，对各国人口贩卖现状及各国相应措施、美国的介入进行报告和评估。^①

三是战争及反恐议题。

这是基督教内各派别最有争议的议题。“911”后，美国的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自由派教会一直在推动与伊斯兰教教的跨信仰对话，除了高层和学术层面的对话和交流，一些本地教会也邀请穆斯林阐释他们的信仰，进行基层跨信仰交流。而保守福音派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则截然不同，正如曾任美国福音联盟政府事务副主席的理查德·西齐克所说“福音派把伊斯兰教看成是苏联的替代物。穆斯林就是现今的邪恶帝国。”^②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自由派主流教会和天主教会均对战争持反对态度，并试图影响美国外交政策，但这类基于道德和伦理的努力并无成效。然而，基于这一角度为小布什政府的战争政策背书则是保守福音派教会领袖的总体倾向，他们与新保守主义结成同盟，将伊拉克战争与反恐联系在一起。2002年10月3日，在主流教会和天主教会表明反战态度后，美南浸会的理查德·兰德（Richard Land）写下致小布什总统的公开信，以其对正义战争理论的阐释为依据，为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对伊战争提供合法性，联署人则均为世界基督教界赫赫有名且极富影响力的福音派领袖。^③在此前后，一众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保守福音派领袖将恐怖主义与整个伊斯兰教混为一谈，

① 2010年最新报告可参 <http://www.state.gov/g/tip/rls/tiprpt/2010/index.htm>

② Laurie Goodstein, "Seeing Islam as 'Evil' Faith, Evangelicals Seek Converts," *New York Times*, May 27, 2003, <http://www.nytimes.com/2003/05/27/national/27ISLA.html>

③ "Land Letter," Oct 3, 2002, <http://erlc.com/article/the-so-called-land-letter/>

通过宣扬伊斯兰教是一种“邪恶宗教”而赋予反恐和伊战神学和政治合法性。^① 他们的行为在美国国内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天主教会和自由派教会反战态度形成的质疑和冲击。根据全国福音联盟 2008 年 2 月针对全国 100 名福音派领袖的调查，绝大多数领袖仍支持伊拉克战争，即便那些认为入侵是错误的领袖亦认为现在不是撤出的时机。^② 在过去数年中，驻阿和驻伊美军来自保守福音教会的随军牧师比例不断提升，超过 50%，而驻阿和驻伊美军士兵中保守福音派人数比例亦远高于国内人口相应比例。^③

新保守主义者成功利用“9·11”主宰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中东政策上，采取推翻萨达姆政权，然后在伊拉克植入民主、进而改造大中东的计划。美国福音派组织与布什政府、尤其是国防部的新保守主义者形成了事实上的战略同盟。尽管在具体措施上，两者有一定区别。新保守主义者希望通过促进伊斯兰内部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达成目标。在入侵伊拉克前夕，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表示“我们需要一场伊斯兰革新。”一年以后，另一位著名新保守主义者、思想库中东论坛（Middle East Forum）主任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宣称反恐战争的终极目标是伊斯兰教的现代化，抑或“宗教建设”。^④ 基督教福音派则希望通过深入传教、救援和发展将“敌人”转化成基督徒以永久解决问题。

伊斯兰世界往往把伊战看作是针对伊斯兰的战争，而保守福音派亦将伊战看成是基督化敌人的良机。战争为美国基督教在中东地区的扩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事工空间，伊战爆发后，以福音派为主体的众多传教组织很快进入

① Kenneth Woodward, “Graham’s Crusade: Should Evangelicals Invade Iraq?” *Commonweal*, June 6, 2003,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252/is_11_130/ai_104578584/; Laurie Goodstein, “Seeing Islam as ‘Evil’ Faith, Evangelicals Seek Converts,” *New York Times*, May 27, 2003, <http://www.nytimes.com/2003/05/27/national/27ISLA.html>

② News, “The Evangelical Leaders Survey, Most Evangelical Leaders Still Support Iraq War,” *The Christian Post*, Aug 12, 2008, <http://www.christianpost.com/article/20080212/most-evangelical-leaders-still-support-iraq-war/index.html>

③ Lee Marsden, *For God’s Sake: The Christian Right and US Foreign Policy*, p. 235.

④ Jim Lobe, “Neocons Seek Islamic ‘Reformation’,” April 8, 2004, <http://www.antiwar.com/lobe/?articleid=2273>

伊拉克及周边国家、地区进行事工。2004年，已有约30个福音派组织在伊拉克开展事工，100余万本阿拉伯语《圣经》运入该国。2005年5月，美国政府开设一个大多数伊拉克人可收看的阿拉伯语卫星电视新闻节目。该节目的制造商为恩典数字传媒（Grace Digital Media），由激进亲以色列的保守福音派谢里尔·里根（Cheryl Reagan）控制。该组织声明这会是“为主而在这一世界事工独一无二的机会。”^①然而，传教事工并未获得预期的进展。争取穆斯林改宗打破了伊拉克长期以来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互不传教的非正式约定，不仅阻力重重，还令基督徒和教会成为攻击目标，传教成为新的冲突来源，至2005年3月，4名美南浸信会的传教士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遭到杀害，至少21座教会遭到炸弹袭击。著名什叶派领袖、巴格达战略研究中心主任（Baghdad's Strategic Studies Centre）吉达（Sheikh Fatih Kashif Ghitaa）表示“大多数伊拉克人认为美国意欲清除伊斯兰教，摩苏尔凶杀案的凶手就抱有这样的思维。还会出现更多攻击。”^②事实上，一些美国差会的新进教徒往往来自伊拉克其他基督教宗派。由于约6万、略等于半数本土原有的基督徒逃离伊拉克，伊战数年来，基督徒在伊拉克人口中的总比例并未增长。^③

与保守福音派教会和传教组织有所不同，尽管基督教国际救援和发展组织在伊战开始后很快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但大多数并不过于公开表明对战争的态度。积极参与伊拉克重建工作的主要基督教国际救援发展组织除具有高度改宗热情的撒马利亚人的钱袋外，还有世界宣明会、美慈国际（Mercy Corps）、路德宗世界救济会（Lutheran World Relief）、教会世界理事会、美国公谊服务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天主教救援会、世界之粮

① Russell Mokhiber and Robert Weissman, "U. S. Hires Christian Extremists to Produce Arabic News," May 2, 2003. <http://www.alternet.org/story/15801/?page=1>

② News, "Missionaries' war for souls raises Iraq tension," March 25, 2004, <http://www.theage.com.au/articles/2004/03/24/1079939714048.html>

③ The Evangelical Leaders Survey, "Most Evangelical Leaders Still Support Iraq War," *Christian Post*, Feb 12, 2008, <http://www.christianpost.com/article/20080212/most-evangelical-leaders-still-support-iraq-war/index.html>

等。^① 由于长期参与各类冲突解决和灾后重建，且与当地各类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各类复杂情境有着较为切实的了解，大型基督教救援和发展组织对战争和冲突积累了丰富的前线知识和事工经验，一般公开支持多边主义，希冀通过多边谈判、协议来促进问题的解决、重建和平。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数月，天主教救援会就一直向支持者散发各类公告和行动警告，鼓励大家“请求总统与他国及联合国合作，用战争的有效替代物来制止伊拉克的威胁。”^② 进入伊拉克开展救援之后，这些组织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渠道达成目标，为此与国务院系统保持合作。世俗的救援与发展组织对保守福音派在伊拉克的传教行为予以谴责，认为他们的做法增大了所有在伊外侨的危险。

总而言之，保守福音教徒对伊战的支持率远胜于天主教徒和自由派基督徒。对战争议题，基督教内的分歧并不小于整个美国社会，绝对的和平主义教会如门诺会等和支持战争的基要教会意见对立。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内部意见不一的基督教界对美国相关政策的影响同时受到政治体系和其他公民团体行动的多重制约，影响相对有限。

四为自由贸易议题。

自由贸易体系往往能为基督宗教的传教事业在世界其他地方开启大门，但众多基督教组织对自由贸易的关注超出传教层面的考量。

基于基督教教义中对贫困者的关注，天主教组织和主流基督教组织正视全球化进程中自由贸易带来的弊端，认为实质不公平的自由贸易有利于富国和跨国公司，却加剧了贫富分化，令穷国和穷人处于更为悲惨的境地。遍布全球的传教组织、救援和发展组织成为目击这些弊端在世界各发展中国家产生的真实社会后果，并将其传回在美的宗教网络。^③ 在此基础上，天主教组织和主流基督教组织超越对美国国家经济利益或美国一国工人利益的保护，

^① Tom Coipuram Jr., “Iraq: United Nations and Humanitarian Aid Organiz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April 16, 2003.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9953.pdf>

^② Pamphlet, “CRS and Iraq—the Human Face of Suffering in the Current Crisis,” *Catholic Relief Services* (2003)

^③ 多个基督教宗派组织、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的网站上均有从各国反馈而来的不公平贸易引起的不良后果之见证，可参 <http://www.tradeweek.org/typo3/en/learn-more/stories.html>

对自由贸易中出现的对它国或它国工人利益的损害给予关注。为此，他们与其他宗教组织和世俗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开展政治倡议，提倡公正贸易或正义贸易，力图影响行政部门的政策抉择和国会的相应立法，以达到实现公平或正义贸易、保护弱者之目的。

2004年1月，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纽约石点城举行会议，与会者为其成员组织，来自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代表提供了大量有关自由贸易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农民、部落民和低收入工人产生的危害事实。会议通过了联合宣言《上帝要求我们如何作为？经济生活中正义贸易的宣言》，宣言确定了正义和公平贸易协定的四大基本原则，政府在签署和执行协议时应考虑的八大政策导向，强调尊重人的尊严、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注重环境保护。^① 此亦为美国多个主流宗派长期以来对自由贸易的基本立场，即以正义贸易为基础。

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USA）下属饥援项目（Hunger Program）和天主教组织关怀中心（Center of Concern）敏锐认识到美国的国内农业政策具有全球影响，2007农场法案（2007 Farm Bill）的具体条款与通过与否影响到世界众多农民的待遇、农户家庭的被迫迁移、种族与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由此，信仰团体必须责问美国的食物和农业政策是否能在全球增进食品权利、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同时保护国内和国际小农场主和农场工人的人权。为此须促请美国的食物和农业政策的出台应衡量对国际与国内最为弱势的群体可能产生的影响，有利于全球人民的共同利益及发展。^② 然而，这些组织的游说对美国国会立法的影响效果极为有限。2007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2007~2012年农业法案，对本国的农业贸易保护继续加强，计划在未来5年中平均每年向农业提供572亿美元补贴，高于之前每

^① “What does God require of us? A declaration for just trade in the service of an economy of life,” January 2004, <http://www.oikoumene.org/fr/documentation/documents/programmes-du-coe/public-witness-addressing-power-affirming-peace/poverty-wealth-and-ecology/trade/just-trade-declaration.html>

^② David Pedulla, “Making the Connections?: US Domestic Agriculture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n Interfaith Perspective,” Presbyterian Hungry Program and Center of Concern, Aug, 2005, 下载地址：<http://www.pcusa.org/trade/downloads/connections.pdf>

年 480 亿美元的水平。美国利用巨额补贴建立起来的农产品国际竞争能力进一步令众多发展中小国农业陷入困境、损害穷国农民的利益。这引发诸多世贸组织成员国对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指责，成为 2008 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农业谈判失败的催化剂。

2009 年 9 月 8 日，自由派主要刊物《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 发表国际政策中心美洲政策项目主任劳拉·卡尔森 (Laura Carlsen) 的文章，呼吁国会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 (NAFTA) 再行讨论，使之符合公平贸易的原则。因为现行体制加重了墨西哥国内的两极分化，伤害了玉米和豆类等产业农民的利益。由此一些基督教组织支持 2008 年向国会提交的贸易革新、可信性、发展和雇佣法案 (the Trade Reform, Accountability,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TRADE) Act)。^①

然而，在公平或正义贸易与组织切身利益之间，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的实际行动与公开立场有所不同。由于某些粮食援助交易形式可能同其他出口补贴形式即出口补贴和贷款产生相同的影响，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粮食援助问题仍然是在《农业协定》“出口竞争”部分项下。欧盟及其他国家批评美国的粮食援助政策是给美国农业的另类补贴，在谈判中提出把对受援国的粮食援助直接或间接与对受援国的农产品商业出口挂钩进行约束，目的是防止使用粮食援助来规避削减出口补贴的义务。目前只有美国以有偿的方式向受援国销售粮食，以期扩大美国粮食的国际市场，保护美国的农业利益，美国也是到目前为止提供非脱钩粮食援助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这一谈判条件不仅有损美国的农业利益，也直接影响到美国国际开发署对美国数个大型基督教救援和发展组织及世俗非政府组织的巨额实物拨款。这一方案遭到这些组织的明确反对，世界宣明会副主席马克·维瑟 (Mark Viso) 于 2005 年 9 月 21 日代表美国 16 个非政府组织在参议院农业、营养和森林委员会作证，请求美国政府对这轮谈判的内容不予支持。这些组织多有基督教背景，如饥饿会、基督教复临会救济发展局 (The Adventist Development and Relief

^① Laura Carlsen, "Trade disagreement: The Inequalities of NAFTA," *Christian Century*, Vol. 126, No. 18, 2009, pp. 10—12.

Agency)、美慈国际、国际东正教慈善会 (International Orthodox Christian Charities)、天主教救援服务会等。^①

此外,天主教和主流宗教组织热心于环境议题,福音派组织近年来亦开始关注这一议题。在这一议题上天主教组织、主流新教组织、温和福音派组织及保守福音派组织同样存在巨大的政策导向分歧。天主教组织和主流新教组织积极支持联合国主导的多边会谈,2000年以来温和福音派亦对这一导向表示赞同。保守福音派组织则与三者截然相反,以神学观念为基础,坚决反对联合国出台的对全球变暖问题的科学报告,赞成布什政府的环境政策。基于基督教锡安主义的特殊神学背景,保守福音派组织普遍亲以,美国对以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且着力甚多的外交政策议题。由于绝大多数基督教传教组织、救援与发展组织对这两个议题介入相对较少,本文对此不进行深入分析。

四、结 语

美国基督教的全球扩张为美国基督教组织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议题选材和遍布世界的基础网络。由于神学思想不一、不同基督教组织和个人政治信念存在歧义,对同一议题采取的对策也各不相同,难以形成合力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同时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基督教组织既有对立又有重合的强烈诉求形成的合力之间既有契合,又存冲突,在此格局下基督教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有限。此外,美国基督教组织的政治参与亦受到组织自身现实利益的束缚,难以超越自身切实利益去追求一些从其神学思想来看符合正义原则的目标。

21世纪国际格局的变化为美国基督教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面向。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令当前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革,但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都具有全面优势。由于美国面临

^① Mark Viso (World Vision vice president of operations , international programs group) , "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oha Round negotiations on agriculture: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 Nutrition , and Forestry , " September 21 , 2005 , 其证词全文参 <http://www.worldvision.org/content.nsf/learn/globalissues-criticalissues-dohaAg>

的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深陷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泥沼的奥巴马执政以来重返尼克松主义，不断调整其全球战略，但实质上仍在努力占领道义制高点。就长远而言，美国仍将采取以实力政治为基础，推动面向全球的民主输出，通过普及（西式）民主和维护（西式）人权而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与此同时，美国是世界基督教的重要中心，对基督教全球扩展之影响无他国堪可比肩。美国基督教不仅对世界各国基督教从神学观念、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观念到组织、制度建设方面的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入，也因其全球性的传教、救援和发展活动对各国的社会、政治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美国基督教团体、尤其是偏保守的福音派及基要派团体对自由、民主的观念传播及相应行动与推动美国全球战略有相辅相成的一面，这类团体正是当前美国基督教全球扩展的主力军，因此他们的扩展与美国霸权地位的保持具有长期相关性。对今后美国基督教的全球扩展与美国全球战略如何合流及如何作用尚需进一步观察与分析。